

赵考古祠：重叠的音韵

古 迹

方其军 文/摄

—

那天午后，在余姚南雷路上走得有些累了，我想拐进笋行弄歇息。顿时，闹市的吆喝避开了，我仿佛被吸入时光隧道。一所房子，瓦檐上斜着些许荒草，墙壁上漫着些许苍苔，就像人到中年。我想象其在年轻的时候，黑瓦白墙，应该是一个清秀俊俏的书生。在无涯的时间里，周遭的变迁哗啦啦地演绎着，而它只是沉默如山沉静如水，就像与时间暗暗较着劲儿。当然，时间一定是无比强大的，如同雨刮器将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不厌其烦地抹去，时间可以将大地上的繁华与琐碎乐此不疲地推倒重来。但是，能与21世纪的我相遇，它已然受到尊敬与礼遇。

这所房子是什么来路？门楣上标识：笋行弄26号。这自然算不上答案。幸好，近旁的文保单位标志碑向我表明，这所房子是初建于明嘉靖年间、重建于清同治初年的赵考古祠。哦，赵考古，久闻大名。赵考古离我们很远，因为他是明代的乡贤，最终在海南与世长辞。赵考古离我们很近，因为纪念他的建筑还在，留在世间的影响绵延久远。祠，作为一种纪念建筑，或许是纪念对象的最终归宿，是比墓室还要终极的所在。因为，墓地只是收留一个人的躯体，而纪念建筑接纳的是一个人的精神。

我在手机上搜索有关赵考古祠的一些资料：该祠为硬山顶，有倒座和正厅两进。通面阔均为14.6米，正厅通进深9.76米，倒座通进深10.1米，梁架结构以抬梁和穿斗相结合。地面用石板铺缝平铺，中



赵考古祠。

间天井250平方米，用石板平铺。专家称，这种由倒座和正厅构成的基本结构，朴素大方的装饰艺术，反映了那一时期余姚乃至浙东地区祠堂建筑的风格。

二

我们已经闻不到明代空气中的味道，但还能摸到明代留传下来的物件，还能听说明代流传而来的故事。端详赵考古祠，赵考古的履历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赵考古，在大明的户口本上印着大名“赵谦”，亦名赵搢谦，又名古则，人称“考古先生”。

我的思绪漫溯至元朝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的余姚冯村冯村，赵考古降生，幼年孤贫，在寺庙寄食。汲取知识是他的一种自觉，不仅“请进来”，还“走出去”。清朝著名学者朱彝尊的《赵谦传》如是描述：“天台郑四表善《易》，则从之受《易》。定海乐良、郑郑真明《春秋》，山阴赵叔长于说《诗》，迨雨善乐府，广陵张昱工歌诗，无为吴志淳、华亭朱芾工草书篆隶，搢谦悉与为友。”可见，赵考古饱

读诗书、博采众长。明洪武十二年（1379年），朝廷召集词臣修编《正韵》，28岁的赵考古满腹才华有了用武之地，应聘而出，任职国子监典簿，诸多学说被采进《正韵》。

赵考古年纪轻轻就在朝廷做事，想必是前程似锦。但是，文人总有文人的意气，可以说是优点，也可以说是缺点，他们容易一言不合就拍案而起或掀桌子走人，哪怕是光芒耀眼的金饭碗也构不成诱惑。这不，不久他因与同僚论事不合罢职而归。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年），经吏部侍郎侯庸举荐，赵考古出任海南琼山县学教谕。62岁的苏东坡曾被贬海南，赵考古似乎走的是苏东坡的老路。只是苏东坡仅留琼三年，而赵考古再没回来。

明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11月，赵考古卧床不起，谓：“太虚不能不聚而为人物，人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，吾不久当归吾元。”短短6年间，赵考古对海南的贡献可谓卓著。清雍正《浙江通志》称：“黎人皆知向化，称为海南夫子。”

打开天窗说亮话



图①：湖南怀化洪江古商城的天窗，从底层望向屋顶，如同“通天楼”。图②：过去上海特有的“老虎窗”群，简直是道风景线。图③：慈溪周巷沙滩路祝家老屋的一面屋顶上安装了多个“天井”，二“堽”宽和三“堽”宽的都有。

老 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“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。暖和的晴天，木板窗扇扇开直，光线和空气都有了。碰着大风大雨，或者北风呼呼叫的冬天，木板窗只好关起来，屋子里就黑得地洞里的似的。于是乡下人在屋面上开一个小方洞，装一块玻璃，叫做天窗。”这是茅盾《天窗》中的一段话。接着他在文中讲述自己童年时，守在地洞似的屋里，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和天真遐想的来源。

《天窗》也道出了我的情愫——我们这些过来人，对老底子的天窗有着特殊的感受。天窗不仅亮了居室，更亮了心情。

天窗，亦可写作“天牕”或“天牕”，是设在屋顶上用以透光和通风的窗子，古代就有。唐代李白在《明堂赋》中说：“藻并彩错以舒蓬，天牕葩翼而銜霓。”句中“葩翼”是指大红色的窗子，“銜霓”是说窗子在阳光映照下呈现出五颜六色。宋代范成大有《睡觉》诗云：“寻思断梦半惺忪，渐见天窗纸瓦明。宿鸟噪群穿竹去，县前犹自打残更。”

慈溪桥头镇小桥头村有一座慈

溪市级文保单位“通天楼”，建于清嘉庆年间，号称“九十九间走马楼”，当地习称“田中央大屋”。为何命名为“通天楼”？于此出生并至今仍住楼内的余长飞老先生说：此楼共四进，有前、中、后三个中厅，第一个中厅中间抬头有个正方形的天窟窿直冲屋顶，上有楼窗而无楼梯和楼板。过去宁波一带走马楼并不鲜见，而这种通天楼形式的走马楼却少见，故成文保单位。可惜通天楼在“公社化”年代里，为增加用房面积被改建，至今未恢复原貌。

这种“通天楼”，我在湖南怀化洪江古商城内也看到过几座。据悉，洪江古商城源于春秋时代，在盛唐渐渐成形，明清时达到顶峰。沈从文先生在《沅水上游的几个县份》中就提到过它：“由辰溪大河上行，便到洪江，洪江是湘西的中心……通常有小重庆的称呼。”洪江古商城内的古建筑群是我国保存较完整、规模建制较大的老屋遗存，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和国家4A级景区。十年过去了，但愿这些通天楼没有被拆。

天窗的种类和样式很多，除了通天楼，苏浙沪一带所说的“老虎窗”也是典型代表。

上海开埠后，不少英国人来沪居住，他们带来了英式建筑。英国冬季气候寒冷多雪，为了减轻积雪

对屋面的压力，他们的房屋大多为高坡度、尖顶式。为了增加采光和通风，又在屋顶开了许多窗。屋顶的英文为“Roof”，其音近上海话“老虎”，于是这种开在屋顶的窗在洋泾浜英语中称为“老虎窗”。20世纪20年代后，随着上海住房紧张的加剧，上海人利用石库门住宅二楼空间较高及斜屋顶的特点，在二楼与屋顶之间加建阁楼，为了增加阁楼的采光和通风，在屋顶上开窗，这种窗也被称为“老虎窗”。

位于慈溪市龙山镇山下村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虞氏旧宅，建于1916年至1929年，系旅沪宁波帮代表人物虞洽卿在家乡营建的中西合璧庭院，前三进是中式木构建筑，后两进是西式建筑。在第一进洋房北坡上，主人连开了一排九个天窗，有效解决了采光问题。

相比之下，茅盾文中所说的“天窗”，其实是最简单的：在屋面开个洞，拿掉二三“堽”瓦片，装上一块平板玻璃就行。二“堽”宽的天窗就能照亮一间房，因此最普遍。三“堽”以上的就是大天窗了。

宁波人叫这种天窗为“天井”，称这块平板玻璃叫“天井玻璃”，简称“天井板”。虽然此称呼易与建筑上的“天井”混淆，但宁波话就是这么说的，详见《宁波方言词典》“天井”词条下的第2个

三

如今，赵考古的追思地有三处：一处是余姚冯村，他的出生地，现存赵氏宗祠启承堂，北侧立有“明考古赵先生故里”碑；一处是海南琼山，他的归葬处。他离世后多年，琼籍学子每年春秋都前往祭扫。明正德年间，唐胄主持修复赵谦墓，亲自撰写碑文。海瑞罢官回乡期间，也曾重修赵谦墓。在清代，官方也多次重修其墓，如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琼州学使徐琪捐俸银将原先的土墓改筑为石墓；还有一处，自然就是赵考古祠了。

从冯村到南京，再从冯村到海南，赵考古看似简单的人生轨迹里蕴含的是一个文人的血性和梦想。我相信，他的精神最后一定回到余姚，回到赵考古祠。

面对纪念建筑遐想，固然是一种缅怀与追思。不过，最好的仰慕在于继承，继承一种精神，继承一种学问。在赵考古祠，我惦念着他“积二十年然后成”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《声音文字通》。今人对赵考古的身份认定有两个，一是教育家，二是音韵学家。我觉得，教育家的身份更大程度来源于朝廷任命的履职，而音韵学家的身份则完全出自他个人的爱好和探求。赵考古著作丰富，撰有《声音文字通》《六书本义》《造化经纶图》《历代谱赞》等，以及识字课本《童蒙习句》、教科书《学范》。其中，以《声音文字通》成就为最。《赵考古文集》自述：“尝兀坐山中，仰而思之，俯而叹曰，六经诸子、史籍图记皆以详悉，历代有人矣。惟音韵之学世久不明。音韵关乎国家同文之教，不可不明。此《声音文字通》所以作也。”可以设想，假如没有赵考古，我们现在使用的普通话，也许足另外一种发音。

黑格尔说：“建筑是凝固的音乐。”我突然觉得，赵考古祠像是流动的重叠的音韵。



回 味

黄志昌

前些日子，有客人问我：“到梁弄的农家乐用餐，能喝到当年的番薯烧酒吗？”我迟疑一下后答道：“没番薯烧酒，只有自酿的吊烧。”客人听后，深为遗憾，从表情可以看出他对番薯烧酒还是情有独钟的。

是呀，我也是喝着番薯烧酒长大的人，那种甜津津、香喷喷的醇厚味儿一直留在记忆深处。番薯烧酒里蕴含的乡情总是深深的、浓浓的，甚至超越了酒香。“番薯烧酒甜津津，喝在嘴里暖到心；出门进门喝一口，一日劳动添干劲。”“自酿土烧香喷喷，一日两餐嘴里进。说长道短有话柄，唱歌行拳亮嗓门。”这些当年的顺口溜，时隔半个多世纪，还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，可见感情不浅啊！

酿制番薯烧酒的原料自然是番薯。四明山区多山地，有自留地、开荒地，还有房前屋后的零星地，凡是空余的地都种上番薯，以补充粮食不足。那年头，家家种番薯，少则几千斤，多则上万斤。“霜降”前后，是番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农家最忙的时候。收进的番薯在屋里堆成小山，要是放不下，就把它藏到野外的番薯种缸里过冬。番薯除了当主食、晒番薯干外，余下的多用来酿制烧酒。酿制番薯烧酒最好的是“小个头”番薯，不用切开，因为有外皮包着，不易黏糊。

在酿制番薯烧酒之前，要做些准备。经验丰富的村民，早在阳春三月就在自家院子里撒上辣蓼草种子，到六月割了辣蓼草，熬制成辣蓼水。然后将大米磨粉混合辣蓼水，做成“小馒头”形状，发酵并晒干，制成酒引白药。如果自家不种辣蓼，就到野外采割。

有了白药，就可制作番薯烧酒。村民们将大小不一的番薯洗干净，放入老虎灶的铁锅里，煮熟后冷却，撒上自制的白药后拌匀，在大酒缸里密封发酵两个月，方可拿出来烧制。

临近过年，酿制烧酒的陶阿宝师傅挑着行头来了。一切安排就绪，只见阿宝师傅将已经发酵的番薯和秕谷或者薯糠混合搅拌均匀，放到一个特制的烧酒容器里。拌入秕谷、薯糠是为了防止黏糊而流不出酒。之后，大灶开始猛火作业，没多久，一股液体就从导管里慢慢地流出来，这就是番薯烧酒。刚刚出来的番薯烧酒，醇香四溢，而且色泽好，放在碗里用火一引，蓝莹莹的火苗悠悠燃起，这是原汁原味的纯酒，没有半点添加剂。

一蒸完了，接着是第二蒸、第三蒸……阿宝师傅一边熟练地烧

义项。

显然，这种“天井”是在平板玻璃普及后才出现在平民家屋顶的。我家慈溪洪山北门的老屋就有数扇“天井”，我小时喜欢爬自家房顶看“四景”，有时好奇地隔着天井玻璃往下窥视室内，有时采摘长在“天井板”四周石灰缝中的瓦花。为了避免“天井”漏水，当我上屋时，母亲总是不停嘱我当心弄碎玻璃。在农村插队时，当地给每位知青搭建了一间小屋，我自己动手为小屋“挖”了一“堽”宽的“天井”，尽管是最小的，躺在床上照样能看到天色。

十几年前我还在贵州和浙江泰顺农村看见过呈弧形的曲面玻璃“天井”，它的宽度和弯度与一般的瓦片相当，长度约是瓦片的两倍，能与瓦片相叠成“堽”，较好地防止“天井”漏水，但采光面积较小。

雨水多的季节，天窗老是漏水；早年治安不靖，盗贼多，天窗总是薄弱处。因此，全国各地设有天窗的房子总归是少数。苏浙沪一带生活质量相对好些，设天窗的房子也就相对多些，毕竟哪个不想“打开天窗说亮话”。现在的住宅建筑讲究通风采光，电力照明设施又齐全，那种身居昏暗古屋、期盼“一窍仰穿，天光下射”的心情自然不复存在了。

（丁安 绘）

惠明桥始建于唐代，是当时鄞县县治（今鄞江镇）通向明州府的水陆通道第一桥。现桥是明正统四年（1439年）重新建造的。清同治戊辰年（1868年）对该桥进行了重修。惠明桥做工精细，造型风雅古朴，有着较高的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。